城乡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严善平 *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城乡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结果发现：第一，党员身份对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的促进效益较强，也较为稳定，但它对非农收入的增收效应呈弱化趋势；相比之下，教育对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以及非农收入的影响均呈弱化趋势。第二，党员身份、教育对城镇居民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党员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概率比非党员高，但学历越高的党员未必越倾向于在国有单位工作；党员身份、教育对能否担任单位负责人的影响非常显著，并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教育回报率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而党员身份的增收效应呈弱化趋势。第三，党员身份的贬值主要发生在普通党员群体，对干部党员来说，其附加值随市场化的推进而迅速上升。第四，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和教育的正面效应趋向弱化，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它们的正面效应趋向强化。从绝对水平来看，城乡之间呈现收敛趋势。

关 键 词 党员身份 教育 就业 晋升 收入

一 引言

据相关统计，2010 年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为 8027 万人，与 1982 年的 3965 万人相

* 严善平，日本同志社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电子邮箱：shyan@ mail. doshisha. ac. jp。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3252008、15K03482）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谢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为本研究提供的优良条件。

比，28 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高达 2.55%，大大高于同期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 0.99%。但是，党员占 18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变化不大，相对水平也较低。该比率 1982 年为 6.6%，2010 年为 6.7%，28 年仅涨了 0.1 个百分点①。在中国，发展党员有总量控制，入党要经过严格审查，所以可以说党员群体是社会的精英。因此，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的不断进化，强化了治理国家的能力（Li et al.，2006；景跃进，2012）。也许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是，如何从微观层面评价党员身份的价值却是一个难题。早在 1980 年代末，就有学者指出了干部身份在体制转型中的机能变化（Nee，1989）。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员既是一种社会身份，也是一种政治资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党员往往比非党员拥有更多的机会从事较高地位和收入的职业，在各级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党员身份往往成为晋升干部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是否党员或许无关紧要。换言之，政治资本在就业、晋升、收入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减弱、甚至消失，而以受教育年限或最终学历来衡量的人力资本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的含义无外乎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生产率，而政治资本却少有这种功能。这种思路很简明，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解释市场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也难以说明普通群众期求入党的内在机制。党员身份在当代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要客观评价它作为政治资本的价值所在，援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或许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研究党员身份对就业、晋升和收入水平是否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以及各种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趋势，并据此评价党员身份的价值所在。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已有不少类似的文献，也有很多值得参考的重要发现和独到见解。例如，Knight & Song（1999）、Riskin et al.（2001）和李实等（2008）利用 1988 年至 2002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城乡住户数据，通过估计收入函数，定量分析了教育（人力资本）与党员身份（政治资本）的回报率；Appleton et al.（2005，2012）、Appleton et al.（2009）也

① 其实，较高的党员增加率有 40% 来自人口规模的扩大、有 40% 来自 18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的上升，来自党员占比上升的仅有 20%。计算公式如下：党员数 = 总人口 ×（18 岁及以上人口数 ÷ 总人口）×（党员数 ÷ 18 岁及以上人口数）。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研究了党员身份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情况，但他们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城镇住户；Pan（2010）利用1988年、1995年和1999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城镇住户数据，重点研究了政治资本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回报率的差异；刘和旺和王宇锋（2010）利用2003年和200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了市场化进程中政治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趋势；还有学者发现党员身份对子女上学的择校行为、就职的单位选择以及收入高低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叶晓阳，2012；李宏彬等，2012；李实、佐藤宏，2004）；关于党员身份与职业地位形成、学历、收入水平之间内在关系的文献也不少（Bian & Logan，1996；Li et al.，2007；杨瑞龙等，2010；Cui et al.，2013；Xia et al.，2013；严善平、魏祎，2014）。

基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对当代中国的党员面貌以及党员身份的经济功能做如下小结：第一，无论城乡，党员占比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男女党员比率差距较大。第二，与非党员相比，党员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在收入较低的阶层，党员身份的增收效果越发显著。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市场化进程中党员身份的增收效果变化不大，甚至有所减弱（Li et al.，2009）。第三，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教育回报率大幅上升，在私营和外资等非国有单位，这种效应尤为显著（李实等，2008；Pan，2010）。

既有研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很多文章或者只利用了某一次或两次城乡住户的调查数据，或者只利用了多次城镇住户的相关信息；在分析方法方面，通过推导收入函数，求得教育回报率、党员身份附加值，再从市场化与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相互关系方面考察相关问题。本文利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全部数据，分别从城乡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党员身份在就业、晋升和收入决定等方面的作用，并将之与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以释明市场经济体制下党员身份保值的内在机制，进而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二部分简要说明全文的分析框架、数据特征，定义相关变量，提出实证分析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定量描述党员群体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实证分析农村和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的功能及其变化；第六部分是实证分析的总结和本文的结论。

二　研究框架、数据及假说

（一）研究框架

在现代社会，职业高度分化，各行各业的技能要求不同、收入水平也大相径庭。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事物的评价标准日趋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人们都希望有个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好的职业，如果两者兼有则更是锦上添花。但是，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好的职业往往十分有限，要想得到它，需要有较强的竞争力和不断的努力，有时还需要运气。所谓运气意指难被个人左右的大背景。如果出生在兵荒马乱、政治动荡的年代，个人的努力程度与事业成功与否相关性不大。但反过来讲，对同时代的每一个人来说，大家所处的外部环境大致相同，成功与失败的决定因素主要还是个人的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这其中就包括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为了反映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我们可以从就业选择、晋升、收入等多方面考察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图 1 是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居民来说，能否在本地的乡镇企业或外地的城镇地区从事非农就业，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有多少，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而对城镇居民来说，能否在政府机关、党群组织、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正规就业，或在工作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可以得到多少收入，也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同时，性别、年龄和民族等个人特征、居住的地区（城乡、东中西部）等因素也会影响个人的就业、晋升和收入①。

（二）本文的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简称 CHIP）。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外研究者共同组织实施，并在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完成的，抽样分别利用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系统。调查覆盖的地区多、样本量大，在可信度和代表性方面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国内外很多学者利用该数据库，在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等领域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②。本文旨在援用劳动经济学的思路和分析方法，对党员身份在就业、晋

① 有关教育和党员身份的决定因素，参见严善平和魏祎（2014）、严善平（2016）。

② CHIP 调查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网站和校际政治及社会研究联盟（ICPSR）网站查询。相关调查的概要，请参考赵人伟等（1999）、李实等（2008，201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项目 2007 年后转至北京师范大学，在继承 CHIP 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更为广泛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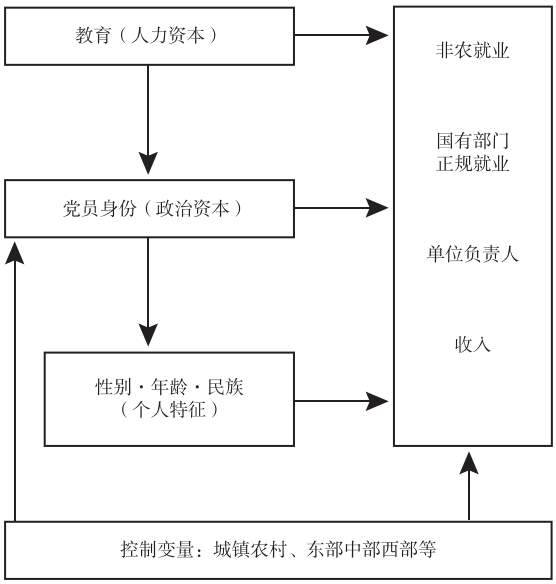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升和收入方面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并把有关结果与教育的作用进行比较，以释明市场化进程中政治资本的功能变化。表 1 是对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三次 CHIP 调查中相关项目的整理汇总。由于三次调查的时间跨度较大，部分问题的表述方式或选答项目均有变化，但经过一定的技术性处理，进行纵向比较分析还是可行的，如受教育年限与最终学历的互换①。

表 1　CHIP 调查表中反映个人特征的相关指标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年龄	○	○	○	○	○	○
性别	○	○	○	○	○	○

① 在 2007 年以后开展的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RUMIC）中，有关个人政治面貌的调查项目没有出现，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只能限定在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其实，在 2008 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类似的其他调查中，政治面貌的调查项目依然存在（刘和旺、王宇锋，2010；严善平，2010）。

续表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民族	○	○	○	○	○	○
婚姻状况	×	×	○	○	○	○
党员身份	○	○	○	○	○	○
入党年份	×	×	○	○	○	×
最终学历	○	○	○	○	○	○
受教育年限	×	×	○	○	○	○

注：○、×分别表示调查表中有、无该调查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调查表相关项目整理。

为了明确本研究的意义，有必要对三次 CHIP 调查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说明。第一次 CHIP 调查在 1989 年 3 月，此时，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企改革大多还处于厂长负责制的初级阶段，70% 的城镇就业人员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就业。在沿海农村和城市郊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就业人员也只有 9545 万人，占农村就业人员的 23. 8%，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约 2700 万人①。可以说，此时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城乡劳动力跨省转移的规制也渐渐放松，到第二次 CHIP 调查的 1995 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下降到 59%，农村非农就业人员占比上升到 33. 5%，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达 5600 万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目标的确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此后到 2002 年实施第三次 CHIP 调查的 7 年中，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民营化进程迅速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被广泛接受。非国有经济地位也从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2001 年的入世更具象征意义。统计数据显示，2002 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人员占比仅为 28. 5%，外出农民工总数突破 1 亿人。应该说，此时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的 CHIP 调查非常巧合地捕捉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有关信息，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解析，可以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变化，深入思考市场

① 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

化与结构变化的内在关系。

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将沿用图 1 所示的思路，分别考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就业、晋升以及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党员身份和教育的作用。具体而言，我们把农户成员是否从事非农就业、非农就业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个人特征变量和相关的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

被解释变量	就业选择	非农就业（从事非农工作、并获得非农收入的农户从业人员，包括兼业人员）=1，农业就业 =0
		国有单位正规就业（在城镇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企业工作的固定工或长期合同工）=1，其他 =0
	职业地位	单位负责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1，其他 =0
	收入（元）	农村非农从业人员月均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和实物折现的总和）
		城镇从业人员月均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和实物折现，自我经营者为净收入）
解释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男性 =1，女性 =0
		年龄：周岁
		民族：汉族 =1，少数民族 =0
	职业地位	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企业）=1，其他 =0
		单位负责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1，其他 =0
	受教育程度（年）	受教育年限：小学 =6、中学 =9、高中 =12、大专 =15、大学及以上 =16
	党员身份	共产党员 =1，其他（包括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0
	控制变量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划分城乡、东部中部西部等虚拟变量
从业人员		指在调查时点从事雇佣劳动，或从事自营业的所有人员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调查表相关项目整理。

（三）本文的假说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员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就得到了高度重视。邓小平 1980 年底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尽管中共党章和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但在高校学生和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研究表明，学历越高的群体成为党员的概率也显著越高（严善平，2016）。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效率优先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导性准则。同时，个人在迁徙、就业等方面的自由程

度也逐渐增大。因此，企业和个人在日常决策中会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以实现经济效益的不断改善。为了对上述思路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在此，提出以下 5 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假说。

假说 1：党员身份（政治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晋升和收入均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人力资本逐渐升值（教育回报率上升），而与生产率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资本逐渐贬值（党员身份附加值缩减）。

假说 2：在农村居民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户籍歧视对就业和工资决定的影响，党员身份和教育对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非农就业收入的正面效应呈弱化趋势。

假说 3：在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正规劳动力市场中，伴随着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壮大，人力资本对就业、晋升和收入的效应逐渐增强，而政治资本的效应逐渐减弱。

假说 4：党员身份附加值的缩减趋势主要表现在普通党员群体，干部党员的身份价值依然较高。同时，党员身份对就任单位负责人的影响极为重要，并且学历越高、入党年龄越小的群体，担任单位负责人的可能性也显著越大。

假说 5：伴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党员身份附加值呈收敛倾向，这意味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有所上升。

实证分析采用 logistic 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前者主要用来分析诸如就业选择、晋升与否等非线性变量的决定因素，数学表现形式如下：

$$\ln \frac{p}{1-p} = b_0 + b_1 X_1 + \cdots + b_n X_n + u \tag{1}$$

其中，p 表示某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X 为相关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 b 为对数几率比（odds ratio），u 为误差项。通常，在解释估计结果时，主要参看对数指数 Exp（b），即几率比，这样比较容易理解。几率比表示解释变量每增加 1 个单位，该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程度的上升。

本文的收入函数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它来源于明瑟（Mincer）工资函数，在劳动经济研究中被广为利用，它的数学表现形式如下：

$$\ln(w) = a + b_1 E + b_2 Age + b_3 Age^2 + b_4 P + \sum_i c_i H_i + u \tag{2}$$

其中，w，E，Age，P 分别表示收入、受教育年限、年龄（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

和党员身份，a 表示常数项，b 和 c 表示回归系数，u 表示误差项，H_i 为性别、民族、居住地区、调查年份等虚拟变量。

在下文的计量模型推算和结果说明时，我们重点考察党员身份和教育对就业、晋升和收入有无作用、作用的大小以及变化趋势，同时也尽可能对性别、民族等相关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三　从 CHIP 调查看中共党员的基本特征

（一）个人特征与党员身份

我们可以利用 CHIP 调查中有关年龄和政治身份的信息，推算 18 岁及以上人口中的党员占比（即党员比率），也可以得到性别、民族别、学历别的党员比率等指标。CHIP 调查的覆盖范围广、样本量大，有关指标的汇总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的总体情况，但由于三次调查样本的城乡分布与该年份的城乡人口比例偏离较大，因此，只能把城镇和农村样本分开统计，党员比率等指标也只能分别进行说明。

表 3 反映了三次 CHIP 调查中城乡住户的党员比率，以及党员的性别、民族别和学历别结构。如表所示，在 1988 年至 2002 年的 14 年中，相关指标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少儿人口增速减慢，18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在农村和城镇均有明显上升，14 年间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这一点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基本一致。第二，党员比率在农村和城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很小，分别为 1.8 个百分点和 3.4 个百分点。城乡党员比率差距较大，1988 年城镇党员比率为农村党员比率的 3.9 倍，随后差距虽有缩小，但 2002 年仍达 3.4 倍。第三，男女别党员比率相差较大，农村尤为如此。1988 年男性党员比率为女性党员比率的 10.5 倍，2002 年缩减至 5.6 倍，大大高于城镇住户同期的 2.9 倍和 1.9 倍[①]。第四，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党员比率越高，并且在农村居民中，这种倾向随时间推移而强化。第五，从党员的个人特征结构来看，城乡住户之间也存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同样为中共党员，城镇党员的受教育水平大大高出农村党员，比如，在 2002 年，城镇

① 在党员身份获得方面，性别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入党的概率显著高于女性。据分析，在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男性入党概率分别为女性的 4.3 倍、3.3 倍和 2.6 倍（严善平，2016）。

党员有 42.9% 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农村党员仅有 3.5%。这可能反映了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不对称。

表 3　按性别、民族、学历计算的党员占 18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和党员的构成比

单位：%

	农村			城镇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18 岁及以上人数(人)	28776	23551	28122	20902	16981	16661
占总人口比率	64.6	70.1	74.3	73.0	78.3	82.6
党员人数(人)	1700	1348	2152	4755	3971	4356
占 18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	5.9	5.7	7.7	22.7	23.4	26.1
女性	1.0	1.0	2.3	11.5	14.0	18.1
男性	10.5	10.4	12.8	33.8	33.1	34.4
少数民族	5.3	5.4	6.3	27.4	21.2	23.7
汉族	6.0	5.7	7.9	22.6	23.5	26.3
大学及以上	0.0	9.4	8.8	49.3	43.2	45.3
大专	9.8	13.3	17.8	45.6	39.1	41.4
高中	12.0	12.5	15.6	23.4	21.7	23.6
初中	7.2	6.3	7.8	18.5	18.8	18.2
小学及以下	4.4	3.8	4.2	14.3	12.0	12.6
女性	8.4	8.5	14.4	24.9	30.3	35.0
男性	91.6	91.5	85.6	75.1	69.7	65.0
少数民族	6.8	7.1	10.9	4.5	3.9	3.8
汉族	93.2	92.9	89.1	95.5	96.1	96.2
大学及以上	0.0	0.4	0.7	12.5	13.9	15.6
大专	0.8	1.3	2.8	12.1	21.3	27.3
高中	18.0	22.9	29.8	33.8	34.5	33.8
初中	36.1	41.4	44.5	29.5	23.4	18.7
小学及以下	45.1	34.1	22.1	12.1	6.9	4.6

资料来源：根据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 CHIP 数据计算得到。

（二）党员与非党员的收入差距

中共党员与非党员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在此，我们利用 CHIP 调查中有关住户收入的指标，定量考察党员的相对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图 2 反映了城乡住户中按不同学

历计算的党员与非党员的收入差距，用党员收入高出非党员收入的百分率来表示（收入的定义见表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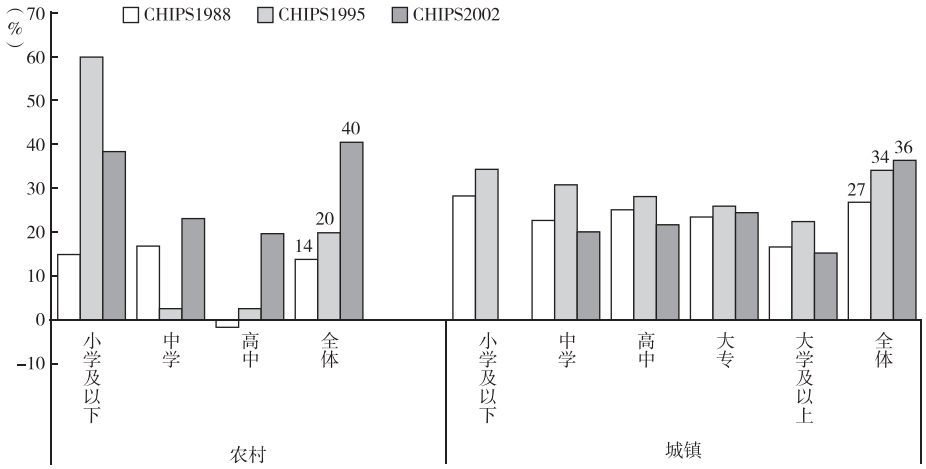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别、学历别党员与非党员的收入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1988年、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计算得到。

显而易见，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与非党员相比，中共党员的收入水平都相对较高，并且随时间推移，党员的相对收入呈现了递增趋势，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农村党员的平均收入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比非党员分别高14%、20%和40%，城镇党员则分别高出27%、34%和36%。有趣的是，党员的相对收入水平在城乡住户之间呈收敛趋势。但是，从学历与党员相对收入的关系来看，城乡之间存有较大的不同。在城镇居民中，受教育程度与党员身份附加值的关系不太明显，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党员，其相对收入甚至不如较低学历的党员。在农村居民中，由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本身较少，学历与党员身份附加值的关系更加不明朗②。在小学及以下人群中，党员的相对收入要大大高于非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1988年至2002年的14年

① 在数据处理时，我们排除了城镇住户中收入极少或收入极高的部分样本。基于平均月收入（w）的分布情况，我们把分析对象限定在以下群体：1988年为5元$\leqslant w\leqslant$500元，1995年为10元$\leqslant w\leqslant$1500元，2002年为10元$\leqslant w\leqslant$5000元。因此被排除的样本在三次调查中分别占17.8%、2.8%、1.9%，1988年的样本排除比率较高起因于月收入的零值较多。由于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的平均月收入采用对数形式，因而在这里排除月收入为0的样本，对前后分析对象的一致性没有影响。

② 由于农村住户中高学历样本有限，汇总结果非常不规则，因此没有在图中表示。

中，党员身份附加值总体来说在农村和城镇内部均有上升趋势，同时城乡之间又存有收敛倾向，但他们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却难以简单概括，需要从多方面做仔细的考察分析。

四　农村地区党员身份的功能及其变化趋势

（一）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对城乡间劳动力转移有严格限制，农户中的部分年青人只能离土不离乡，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劳动。后来，离土又离乡式的外出务工经商迅速增加，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主要形式，对农户提高收入水平发挥了主要作用（严善平，2007，2009）。在非农就业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较高，非农就业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因此，有必要分析哪些因素对人们的就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教育、党员身份、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如表 4 所示，在 16 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中，回答有非农从业收入的人口比率在 1988 年仅有 6.9%，而 1995 年上升为 21.9%，2002 年达 34.5%。在此，我们以 16 岁及以上人口为分析对象，把在调查时点回答有非农从业收入的个人赋值为 1（即非农从业人员），其他人员定义为 0，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①、个人特征以及相关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再利用三次 CHIP 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 4 是计量分析结果的汇总表，B 和 Exp（B）分别为偏回归系数和几率比（odds ratio）。

表 4　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决定因素（16 岁及以上人口）：logistic 模型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B	Exp(B)	B	Exp(B)	B	Exp(B)
非农从业人员占比(%)	6.9		21.9		34.5	
常数项	-5.711	0.003***	-3.941	0.019***	-3.978	0.019***
男性	0.487	1.628***	1.219	3.383***	1.536	4.645***
年龄	0.042	1.043***	0.061	1.063***	0.116	1.123***

① 其实，在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党员中，有很多人是工作后入党的。所以，党员身份与非农就业之间更多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续表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B	Exp(B)	B	Exp(B)	B	Exp(B)
年龄平方/100	-0.051	0.950***	-0.096	0.909***	-0.178	0.837***
已婚			-0.123	0.884***	-0.041	0.960***
汉族	0.477	1.611***	0.500	1.648***	0.651	1.917***
受教育年限	0.156	1.169***	0.065	1.067***	0.034	1.034***
中共党员	0.745	2.107***	1.120	3.064***	0.693	1.999***
中部地区	-0.240	0.787***	0.119	1.126***	0.121	1.129***
东部地区	1.322	3.750***	0.665	1.945***	0.472	1.603***
Cox - Snell R^2	0.076		0.132		0.192	
Nagelkerke R^2	0.177		0.200		0.264	
样本数	29381		23779		2808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1988年、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计算得到。

如表4所示，在三个不同的调查时点，个人特征与就业选择之间都显现了较强的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女性而言，男性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要高出很多，并且随时间推移，这一倾向越发增强；年龄变化与非农从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形关系，在青壮年时期，年龄增加有利于非农就业，而过了一定年限，非农就业机会转向减少；相对于少数民族，汉族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并且其随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增加；结婚成家不利于非农就业，但这种倾向不是十分明显，还有弱化趋势；相对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但这一倾向在东部地区呈弱化趋势。这里，要特别注意教育、党员身份与非农就业的关系。如表4中的Exp（B）所示，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影响的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在1988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选择非农就业的几率比为1.17；1995年降至1.07；2002年仅有1.03。这意味着，教育因素对选择非农就业的影响逐渐减弱。相比之下，党员身份对选择非农就业的正面影响不仅几率比较大，也比较稳定。相对于非党员，中共党员从事非农就业的几率比在1988年为2.1，1995年曾一度上升到3.1，2002年维持了2.0的较高水平。就是说，在农村居民中，党员身份作为政治资本与从事非农就业依然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把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再来看它对就业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考察党员身份的含义。三次CHIP调查数据显示，18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中，1988年、1995年

和 2002 年的党员比率依次为 5.9%、5.7% 和 7.7%，在基层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就任干部的占比依次为 3.3%、2.9% 和 3.4%，身为党员同时又是干部的干部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率依次为 23.3%、27.9% 和 26.0%。在农村住户的党员中，有四分之三的群体都是普通党员。在表 4 的模型中，以普通党员、干部党员取代党员变量，再次模拟分析后发现，相对非党员，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普通党员选择非农就业的几率比分别为 1.2、1.8 和 1.2，干部党员选择非农就业的几率比分别高达 6.6、23.3 和 67.6①。由此可见，党员身份虽有利于选择非农就业，但如果仅仅是普通党员，其效应十分有限；而干部党员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增加，并且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这种优势还会进一步增强。

（二）党员身份、教育对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党员身份对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表 5 是建立在明瑟（Mincer）工资函数基础上的计量分析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农户非农从业人员的月收入（采用自然对数形式），解释变量包含了个人特征变量、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等。从偏回归系数和统计显著性，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基本事实。

第一，在 1988 年的农村住户中，性别、年龄、民族等个人特征变量与收入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到了 1995 年，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的收入显著上升，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开始形成（1995 年相差 38.7%，2002 年相差 28.5%）。性别和年龄因素直到 2002 年才开始显著影响收入，男性收入比女性高 6.6%，年龄与收入之间呈倒 U 形关系。

第二，教育对非农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一直呈现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可带来的收入增加率（即教育回报率）在 1988 年为 10.3%，1995 年为 7.1%，2002 年为 4.8%，总体来看明显下降。把三次调查样本合并，可得到平均教育回报率为 6.3%。农村非农就业人员的教育回报率呈下降趋势可能源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农村教育迅速发展，以至于人力资本相对贬值；另一方面，在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在就业和工资待遇等方面遭受制度歧视（严善平，2010）。

第三，党员身份对收入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它的效果呈弱化趋势。在 1988 年，党员的收入比非党员要高出 74.1%，到了 1995 年，相差仅有 20.4%，2002 年为 26.6%。但是，从混合样本的分析结果来看，普通党员的身份附加值相对较少，

① 因篇幅所限，未报告该部分估算结果。

仅比非党员高 8.9%，而干部党员的身份附加值较大，比非党员高 59.7%。也就是说，党员身份本身的附加值比较有限，入了党又当了干部才可以得到比非党员更高的收入。

表 5　农户非农就业人员的收入函数（16～64 岁人口）：OLS 模型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混合样本
常数项	3.106***	3.777***	3.852***	2.346***
男性	-0.063	-0.019	0.066***	0.027
年龄	-0.039	-0.014	0.022***	0.001
年龄平方/100	0.022	0.004	-0.049***	-0.022***
汉族	-0.274	0.387***	0.285***	0.247***
受教育年限	0.103***	0.071***	0.048***	0.063***
中共党员	0.741***	0.204***	0.266***	
普通党员				0.089***
干部党员				0.597***
中部地区	1.072***	0.157***	0.235***	0.297***
东部地区	1.134***	1.237***	0.973***	1.062***
1995 年				1.443***
2002 年				1.729***
调整后的 R^2	0.072	0.209	0.155	0.208
样本数	2312	5026	9317	16657

注：***、**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 CHIP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城镇地区党员身份的功能及其变化趋势

本部分考察党员身份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基本思路与第四部分相同。这里，我们把是否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是否为单位负责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表示城镇居民的就业和晋升，再实证分析它们的决定因素。随后，推算城镇居民的收入函数，求得教育回报率、党员身份附加值，据此说明市场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上一部分的基本相同，变量的定义如表 2 所示。

（一）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决定因素

把调查时点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固定工或长期合同工）的 18 岁及以上城镇居民赋值为 1，其他形态的从业人员赋值为 0，回归分析采用 logistic 模型。表 6 是对三次 CHIP 调查的估计结果，分别表示个人特征、党员身份、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与选择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关系。模型中加入了党员身份与受教育水平的交叉项，以进一步表现两者的内在关联。

表 6　城镇居民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决定因素（18 岁及以上人口）：logistic 模型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B	Exp(B)	B	Exp(B)	B	Exp(B)
正规雇用者占比(%)	65.3		70.2		36.5	
常数项	-5.320	0.005***	-4.487	0.011***	-10.903	0.000***
男性	0.804	2.235***	0.482	1.619***	0.596	1.814***
年龄	0.350	1.420***	0.217	1.242***	0.494	1.639***
年龄平方/100	-0.476	0.621***	-0.207	0.813***	-0.603	0.547***
汉族	0.163	1.177*	-0.218	0.804**	-0.062	0.940
中共党员	0.948	2.579***	0.792	2.209***	0.847	2.332***
大学及以上	1.997	7.370***	1.204	3.334***	1.703	5.488***
大专	1.375	3.953***	1.288	3.624***	1.690	5.421***
高中	0.674	1.962***	0.785	2.192***	0.778	2.178***
小学及以下	-0.683	0.505***	-1.069	0.343***	-0.681	0.506***
中共党员×大学及以上	-0.559	0.572**	0.064	1.066	-0.052	0.949
中共党员×大专	-0.200	0.819	-0.075	0.927	-0.338	0.713***
中共党员×高中	-0.069	0.933	-0.349	0.706***	-0.244	0.784**
中共党员×小学及以下	0.007	1.007	0.484	1.623***	0.324	1.382
中部地区	-0.465	0.628***	0.048	1.050	0.005	1.005
东部地区	-0.865	0.421***	-0.312	0.732***	-0.279	0.757***
Cox - Snell R^2	0.270		0.179		0.271	
Nagelkerke R^2	0.373		0.254		0.370	
样本数	20944		16981		1691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 CHIP 数据计算得到。

1988 年的估计结果显示，一个城镇居民能否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极为重要。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相比，拥有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个人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几率比分别为 1. 96、3. 95 和 7. 37，1995 年和 2002 年的分析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概率越大。党员身份在各次调查的估计结果中也显现了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与非党员相比，党员更倾向于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的几率比依次为 2. 60、2. 21 和 2. 33，呈现了高度的稳定性。党员身份与受教育水平交叉项的偏回归系数在 1988 年的模型中，基本上都表现为负数。这意味着，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概率随文化程度上升而下降，党员身份的作用是负面的。也可以说，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党员群体相比，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的党员群体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概率更低。但是，这里所说的现象只能表示交叉项与党员身份、教育有多大程度的偏离，要全面理解它们的作用还要进一步分析。我们利用 1988 年的估计结果说明其中的内在关联。与非党员相比，党员身份对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正面影响（即偏回归系数，亦即几率比的对数），在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群体中为 0. 948，而在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群体中却只有 0. 389（即 0. 948 – 0. 559），以此类推，大专、高中和小学及以下的群体中，该效应分别为 0. 748、0. 879、0. 955。可以说，在 1988 年学历越低的党员越倾向于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在 1995 年和 2002 年的模型中，党员身份有利于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但教育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如 1988 年的倾向性特质。上述分析可总结如下：在 1988 年到 2002 年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党员身份均对城镇居民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有较强的正面效应，但是，拥有较高学历的党员未必就更倾向于国有单位正规就业。

（二）就任单位负责人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我们来考察成为单位负责人的影响因素，即个人特征、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等要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能否担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在此，我们依据 CHIP 调查中的相关信息，把选答“单位负责人”的群体赋值为 1，把选答其他职业的全部就业人员赋值为 0，对 18 岁及以上的城镇居民进行分析。表 7 是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的汇总。

在三次城镇住户调查中，选答“单位负责人”的群体占 18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依次为 5. 5% 、10. 7% 和 6. 3% ，相对水平不是很高。因此，能称得上“单位负责人”的群体，可以说是各级单位的精英。那么，谁能成为精英呢？如表所示，男性就任单位负责人的绝对优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年龄与就任单位负责人的概率之间存在倒 U 形

关系，而民族因素对就任单位负责人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就任单位负责人的可能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对就任单位负责人均显现了正面效应。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就任单位负责人的几率比在 1988 年为 1. 12，在 1995 年和 2002 年分别为 1. 17 和 1. 34，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趋势。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就任单位负责人的几率比更高，在 1988 年达 7. 92，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 7. 48 和 5. 50 的较高水平。当然，党员身份有利于升任单位负责人，并不意味所有党员都有均等的机会荣升。我们把分析对象限定在党员群体，再利用表 7 的 logistic 模型进行推算。结果显示，入党年龄与升任单位负责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而言，在较为年轻时入党的群体升任单位负责人的概率较大，但这种效应随时间推移趋向弱化（严善平，2016）。

表 7　单位负责人的决定因素（18 岁及以上的城镇居民）：logistic 模型

	1988 年		1995 年		2002 年	
	B	Exp(B)	B	Exp(B)	B	Exp(B)
单位负责人占比(%)	5. 5		10. 7		6. 3	
常数项	-16. 176	0. 000 ***	-10. 345	0. 000 ***	-19. 122	0. 000 ***
男性	1. 137	3. 118 ***	0. 786	2. 195 ***	1. 105	3. 020 ***
年龄	0. 448	1. 565 ***	0. 170	1. 186 ***	0. 510	1. 665 ***
年龄平方/100	-0. 455	0. 634 ***	-0. 138	0. 871 ***	-0. 552	0. 576 ***
汉族	-0. 092	0. 912	0. 382	1. 465 **	-0. 026	0. 974
受教育年限	0. 114	1. 121 ***	0. 155	1. 168 ***	0. 296	1. 344 ***
中共党员	2. 070	7. 923 ***	2. 012	7. 479 ***	1. 705	5. 500 ***
中部地区	0. 019	1. 019	0. 045	1. 046	-0. 017	0. 983
东部地区	-0. 093	0. 911	-0. 071	0. 932	-0. 107	0. 898
Cox - Snell R^2	0. 116		0. 170		0. 131	
Nagelkerke R^2	0. 332		0. 346		0. 350	
样本数	20866		16980		16877	

注：***、**和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 CHIP 数据计算得到。

（三）城镇从业人员的收入函数

最后，我们来估计城镇从业人员的收入函数，考察党员身份、教育等因素与收入水平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为月均收入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除个人特征、教育和党员身份外，还加入了反映职业、工作单位性质的变量，以及党员身份与职业、单位性质

的交叉项。表8是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汇总，报告了各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

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个人特征对收入的影响表现了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尽相同的特征。在三个调查年份，男性和女性之间均显现了10%～15%的差异，年龄与收入水平呈倒U形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很显著，2002年汉族的收入反而较低。教育、党员身份对收入的影响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也有较大区别。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在1988年仅有2.1%，相当于同年农村居民的大约五分之一。但在此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教育回报率也不断上升，到2002年达7.4%，大大超过同年农村居民的4.8%。与非党员相比，拥有党员身份的群体可以得到8%左右的附加值，并且这一相对水平在三个调查时点高度稳定。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单位负责人”收入较高且有显著的增加趋势。与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相比，国有单位的收入水平要高出20%左右，并且在三个调查时点相对稳定。这表明，就任单位负责人或在国有单位就业，均可以比其他从业人员得到更高的收入。

表8　城镇就业人员的收入函数（16～64岁城镇居民）：OLS模型

	1988年	1995年	2002年	1988年	1995年	2002年
常数项	2.834***	3.525***	4.135***	2.796***	3.523***	4.137***
男性	0.136***	0.110***	0.151***	0.136***	0.110***	0.151***
年龄	0.082***	0.079***	0.058***	0.083***	0.078***	0.058***
年龄平方/100	-0.090***	-0.076***	-0.056***	-0.092***	-0.076***	-0.056***
汉族	0.021	0.011	-0.066**	0.019	0.012	-0.065**
受教育年限	0.021***	0.041***	0.074***	0.021***	0.041***	0.074***
中共党员	0.079***	0.089***	0.081***	0.194***	0.151***	0.102***
单位负责人	0.034***	0.049***	0.098***	0.046*	0.097***	0.225***
国有单位从业	0.199***	0.176***	0.218***	0.220***	0.184***	0.217***
中共党员×单位负责人				-0.002	-0.070**	-0.178***
中共党员×国有单位从业				-0.143***	-0.060*	-0.002
中部地区	-0.122***	-0.076***	-0.108***	-0.121***	-0.076***	-0.108***
东部地区	0.123***	0.247***	0.281***	0.124***	0.247***	0.280***
调整后的R^2	19067	11891	10127	19067	11891	10127
样本数	0.345	0.290	0.283	0.348	0.291	4.13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1988年、1995年和2002年CHIP数据计算得到。

在上述模型中加入“党员 × 职业”和“党员 × 单位所有制”交叉项，可以进一步看到党员身份与收入的深层关系。加入交叉项回归后可以看出以下重要事实：第一，相对于非党员，党员身份的确带来了显著的直接增收效应；在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分别为 19.4%、15.1% 和 10.2%。第二，中共党员担任单位负责人对收入的影响在三次调查中表现不一。在 1988 年，中共党员担任单位负责人后在收入方面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但到了 1995 年和 2002 年，中共党员担任单位负责人后收入反而降低了 7% 和 17.8%（交叉项系数分别为 −7% 和 −17.8%）。由此可见，在考虑担任单位负责人对党员增收效应的负影响后，党员身份的净增收效应在 1995 年为 8.1%（即 15.1% −7%），在 2002 年为 −7.6%（即 10.2% −17.8%）。第三，中共党员通过在国有单位就业对收入的间接影响为负，但党员身份的净增收效应仍为正。中共党员与国有单位从业的交叉项系数在 1988 年和 1995 年分别为 −14.3% 和 −6.0%，在 2002 年则不显著。考虑到在国有单位就业对党员增收效应的间接影响后，中共党员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净增收效应在 1988 年为 5.1%（即 19.4% −14.3%），在 1995 年为 9.1%（即 15.1% −6.0%）。

综合上述党员身份对就业和晋升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 1988 年至 2002 年的城镇居民中，党员身份既有利于个人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也有利于个人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效应相互影响，最终带来了个人收入的显著增加。

六　总结与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城乡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中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个人的就业、晋升和收入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趋势，以下是基于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第一，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教育对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以及非农就业的收入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党员身份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强，也较为稳定，但它对非农就业收入的促进效应呈弱化趋势。相比之下，教育对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均有显著的弱化趋势。党员身份对非农就业及其收入的促进效应呈下降趋势，但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普通党员群体，对干部党员来说，党员身份的附加值呈现出提高的趋势。第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教育对城镇居民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高学历人员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倾向随时间推移而弱化。党员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概率比非党员高，但学历越高的党员未必越倾向于在

国有单位工作。党员身份、教育对能否担任单位负责人的影响非常显著，并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教育回报率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而起源于党员身份本身的附加值呈缩减趋势。综合考虑党员身份对国有单位正规就业以及对担任单位负责人的正面效益，党员身份的附加值变化不大。也就是说，普通党员的附加值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干部党员、在国有单位正规就业的党员，其附加值是迅速提高的。第三，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和教育对就业、晋升和收入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两者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正面效应趋向弱化，而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正面效应趋向强化。从两者的绝对水平来看，城乡劳动力市场中的这些效应有明显的收敛倾向。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除了有关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以及城镇居民党员身份附加值的假说（即假说1）没能得到显著的统计支持，其余的假说基本上可以成立。本文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党员身份的作用，援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定量解析政治资本的内在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员总人数成倍增加，但党员的占比依旧很小，占比的变化也不大，可以说党员身份的供给制约较强。在如此制度背景下，入党竞争激烈，其结果是拥有较高学历的个体优先入党。从党员身份的需求侧来看，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党员身份作为政治资本对就业、晋升、收入均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干部党员尤甚。因此，期求入党合情合理，年轻有为的先进分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共党员。

总之，党员既是一种政治身份，同时也是反映个人综合能力的资本，合二为一即为政治资本。既然是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得到相应的回报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同时，还必须指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的进展也在不断增强。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非凡的经济增长。当然，上述结论应该限定在1980年代末至21世纪伊始的体制转轨时期。有部分基于同样问题意识的研究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党员身份附加值有进一步缩减的趋势，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消失（刘和旺、王宇锋，2010；严善平，2010；严善平、魏祎，2014）。党员身份附加值事关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今后有必要不断发掘新数据，继续展开相关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景跃进（2012），《转型、吸收与渗透》，载于菱田雅晴主编《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战

略》，东京：三和书籍。

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2012），《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第 1011 – 1026 页。

李实、赖德胜、罗楚亮（2013），《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实、史泰丽、别雍·古斯塔夫森（2008），《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实、佐藤宏（2004），《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刘和旺、王宇锋（2010），《政治资本的收益随市场化进程增加还是减少》，《经济学（季刊）》第 9 卷第 3 期，第 891 – 907 页。

严善平（2007），《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 6 期，第 4 – 13 页。

严善平（2009），《从农村到城镇——1 亿 3000 万农民工的大移动》，东京：岩波书店。

严善平（2010），《中国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上海市、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就业、工资与生活》，京都：晃洋书房。

严善平（2016），《中共党员的属性特征及党员身份的功能》，《亚洲经济》第 57 卷第 2 期，第 2 – 34 页。

严善平、魏祎（2014），《中国大城市职业阶层与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机制——基于 1997 年、2008 年天津市民调查的实证研究》，《亚洲经济》第 53 卷第 5 期，第 2 – 32 页。

杨瑞龙、王宇锋、刘和旺（2010），《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收入》，《经济学（季刊）》第 9 卷第 3 期，第 871 – 890 页。

叶晓阳（2012），《以权择校：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世界经济文汇》第 4 期，第 52 – 73 页。

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Appleton, Simon, John Knight, Lina Song & Qingjie Xia (2009). The Economic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The Curious Case of Rising Numbers and Wage Premium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5 (2), 256 – 275.

Appleton, Simon, Lina Song & Qingjie Xia (2005). Has China Crossed the River? The Evolution of Wage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during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 (4), 644 – 663.

Appleton, Simon, Lina Song & Qingjie Xia (2012). Understanding Urban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1988 – 2008: Evidence from Quantile Analysi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7101.

Bian, Yanjie & John Logan (1994).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5), 739 – 758.

Cui, Yuling, Daehoon Nahm & Massimiliano Tani (2013). Earnings Differential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1995 – 2008.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7349.

Knight, John & Lina Song (1999). *The Rural-Urban Divide: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Hongbin, Lingsheng Meng & Junsen Zhang (2006).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44 (3), 559 – 578.

Li, Hongbin, Pak Wai Liu, Junsen Zhang & Ning Ma (2007).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7 (523), 1504 – 1520.

Li, Shuang, Ming Lu & Hiroshi Sato (2009). Power as a Driving Force of Inequality in China: How Do Party Membership and Social Networks Affect Pay in Different Ownership Sectors?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55 (3 – 4), 624 – 647.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663 – 681.

Pan, Xi (2010). The Labor Market, Political Capital, and Ownership Sector in Urban Chin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Riskin, Carl, Renwei Zhao & Shi Li (2001).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Xia, Qingjie, Lina Song, Shi Li & Simon Appleton (2013). The Effects of the State Sector on Wag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88 – 2007.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7142.

The Roles and Tre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China's Urban and Rural Labor Market: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Yan Shanping

(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Doshish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o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membership and their trends in China's labor market, using CHIP data from 1988 to 2002.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effect of CCP membership on promoting the rural residents to choose non-farm employment is not only strong, but also stable, while it has a weakening trend for non-farm earning. In contras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choice of non-farm employment and non-farm income is weakening. Second, being CCP membership and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for urban residents to work in the state-owned units as formal employee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mployment in these units is higher for the CCP members than others,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CP memb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in the state-owned units; being CCP membership and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ecoming a unit's leader, and the effects strengthen with time. Th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continues to rise, while the earning premium of CCP membership shows a reduction tendency. Third, the devaluation of CCP membership mainly occurs in the non-CCP-members, but for those with a cadre status, the premium increases rapidly with marketization. Fourth, in the rural labor marke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being CCP membership and education on employment choice, promotion and earning tend to weaken, while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these positive effects tend to strengthen. From the absolute level, the rural and urban labor market show a tendency to converge.

Keywords: CCP membership, education, employment choices, promotion, wage

JEL Classification: J3, J4

(责任编辑：周敏丹)